

发展新质生产力如何做到“因地制宜”

吕鹏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新质生产力，反复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不能大呼隆、一哄而起、一哄而散，一定要因地制宜”。“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更好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遵循。

在实践中，新质生产力已经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在此背景下，进一步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高度重视“因地制宜”？

从宏观层面看，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个不平衡不充分，既体现为城乡区域发展水平尚有明显差距，又体现为不同地区的发展基础、资源禀赋和能力潜力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地区因自然地理和社会条件不同，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业体系。如东北地区具有良好的重工业基础，东部沿海地区拥有发达的轻工业。如果将观察的层面细化到具体省市乃至乡镇，就会发现，各地的资源禀赋大不相同，在产业发展上也各具特点。

就发展实际而言，传统产业是现代产业体系的基础，仍是我国经济的重

要支柱。尤其是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地方经济发展、就业稳定和财政收入增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能将其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而是要基于现实基础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最终实现新旧动能平稳接续与有效转换。如东北地区可依托原有重工业基础推动装备制造业升级，东部沿海地区则可发挥轻工制造业优势拓展高端品牌与定制化生产。

当前，一些地方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还存在盲目行为。有的地方未能正确认识“立”与“破”的辩证关系，一味求新求异求快，将大量人力、土地和财政资源投入到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之中，却未充分考虑到自身缺乏相应的产业基础，结果新的产业长期停留在概念和宣传展示层面，不仅产业发展与实际严重脱节，而且压缩了传统产业的发展空间，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这些都说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那么，如何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把握好因地制宜这一科学方法呢？

一是全面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新产业和未来产业就等同于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不意味着传统产业经过转型升级就不能形成新质生产力。应跳出“新产业依赖症”，摒弃片面的“抄作业”思维，需聚

焦地方优势资源，做好“老树发新芽”的文章。既要坚持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又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稳基础的前提下前瞻性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二是重视用好“穷办法”和“土办法”。一些过去行之有效的“穷办法”“土办法”在着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今天仍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所谓“穷办法”，就是在特定发展阶段和资源条件下，采取符合本地实情、实效明显的产业发展路径。所谓“土办法”，主要是充分挖掘地方各种资源条件，在尊重地方性知识、文化传统和产业基础的条件下，寻找适应当地的方法。要认识到“穷办法”“土办法”里也有“真知识”，也能长出“富产业”，必须力戒形式主义，把有限的资源和力量用在刀刃上，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产业发展质量。

三是强化产业链协同与新旧产业联动。立足本地已有优势产业，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推动产业链各个环节实现效率和质量的提升。一方面，优化产业布局与形成协同机制。制定科学的产业协同发展规划，明确特色主导产业，推动资源向重点领域集中，避免产业过度分散。针对多样化的传统产业，可通过产业关联分析筛选具备协同潜力的行业，推动形成配套联动。同时，以产业园区为载体打造产业集群，促进企业集聚和形成规模效应。另一方面，增强链主企业的带动作用。鼓励链主企业开放技术接口与数据

平台，引领上下游中小企业共同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针对产业链条较短的问题，可开展强链补链工程，通过精准招商吸引配套企业，弥补关键环节缺失。

四是自觉将基层创新与顶层设计相协调。中央提供方向性指引和制度保障。地方因地制宜探索实践路径，也可以通过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经验。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符合复杂经济系统的演化规律。因地制宜不是分散化，而是精细化统筹的一种高级形态，强调在国家战略指引下，基于地方比较优势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这正是实事求是的具体体现，也是新质生产力能够真正扎根生长的关键。

还要看到，新质生产力发展可能伴随着就业结构变化、劳动力技能需求升级等现象。例如，传统工业基地需兼顾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超大城市要考虑新场景对新就业群体的影响，等等。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各地将本地纷繁复杂的历史、文化、社会等非经济因素纳入到经济政策的评估当中，同步设计社会政策，防止出现“合成谬误”。需更加重视通过市民服务热线等渠道聆听社会声音，汲取群众智慧、做好社会动员，从发展视角努力补齐现存民生短板，在回应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中开拓经济发展新空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破除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

李爱民

党的二十大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作出部署，强调“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这是缩小我国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途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2013年的53.73%提升至2024年的67.00%，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13年的2.81降至2024年的2.34。然而也要看到，当前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的高效顺畅流动仍面临一些制度障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阻碍了城乡的互惠共进。

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呈现二元特点。土地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促进土地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不仅能够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还能够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我国城乡土地管理制度有所不同，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城乡建设用地要素市场化程度差异较大，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尚未统一。同时，相关法律保障、配

套机制还不完善，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有待深化，农村不少“沉睡”的土地资源亟待盘活。

劳动力要素城乡流动存在双向障碍。人是最为活跃的生产要素。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可以保障城市用工需求，推动城市产业发展，同时也能增强农村发展动力和活力，推动农业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然而，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面临户籍制度与公共服务覆盖不足的双重约束。同时，由于乡村地区发展相对滞后，相关制度激励不足，无法有效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人口老龄化、村庄空心化、乡村活力不足等问题较为突出，影响了乡村地区的高质量发展。

资本要素单向流动明显。资本是流动性最强的生产要素之一。资本在城乡间的双向自由流动，可以带来支持产业发展的资金、经验等，提高整体经济效率。但由于农村地区土地等资源产权的特殊性、农作物畜禽等生物资产价值评估难以以及交易市场不健全等因素，农村地区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同时，大量农村资金又通过银行储蓄的方式流向城市。尽管国家引导和鼓励工商资本下乡，但由于规则以及监管的不完善，资本要素下乡

助力“三农”的效应仍未得到充分发挥。破除上述障碍，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取得更大突破，需运用改革思维，从小切口着手、以大力度推进，打通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通道，从而为城乡融合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一是推动土地产权明晰化、交易平台化、收益共享化。可通过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形成农村土地的权属信息“数字身份证”，并利用卫星遥感等技术保障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信息动态更新，实现产权明晰化。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健全交易平台，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推动形成同权同价、流转顺畅、收益共享的局面。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实现收益共享。明晰产权、平台交易和收益共享三者形成协同闭环，推动土地要素从“沉睡”向“活跃”转变，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二是强化人才流动的激励与保障。一方面深入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激励机制，探索建立土地钱挂钩、以人定地、钱随人走制度，破除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

镇的制度性障碍，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另一方面积极营造支农助农的良好氛围。加强支持人才入乡创业就业和服务乡村相关制度建设，创新农村专业技术人才评价机制，允许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探索人才加入机制。加强对人才服务基层的编制和资金保障，协助解决返乡人员医疗、子女入学等问题。加大科技人才选派支持力度，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专业技术人员到乡村挂职兼职和离岗创新创业。

三是统筹发挥财政资金、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的作用。通过设立乡村振兴基金吸引各类资本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项目，强化财政资金的撬动效应。创新金融资本的使用模式，发展供应链金融、农产品期货等金融工具，利用大数据优化农村信用评价体系，提升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融资能力。围绕产业链延伸引导社会资本流向，通过政策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业全产业链建设，重点投入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等领域；同时完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保底分红、股份合作等方式确保农民分享增值收益。（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

发展就业友好型数字经济

李涛 徐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使命”，并强调要“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模式”。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发展与就业的关系，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数字经济作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速度重塑经济社会面貌。深刻理解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复杂影响，使数字经济朝着就业友好的方向演进，不仅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

数字经济促进就业提质扩容
数字经济极大扩充就业岗位容量。数字技术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催生了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一系列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开辟了广阔就业领域。电子商务的兴起带动了数以千万计的在线零售、客户服务、仓储物流岗位；智慧出行平台为大量驾驶员提供了灵活就业机会；在线教育、远程医疗、数字文化内容创作等新兴服务业态，创造了在线教师、互联网医生、数字内容创作者、虚拟现实工程师等新的职业类别。这些新增岗位不仅规模大，而且类型多元，有效吸纳了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与此同时，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创造了大量融合数字技能与行业知识的复合型就业岗位。我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为新产业新业态提供了肥沃生长土壤，进一步加速了就业岗位的衍生和扩张，发挥了就业“蓄水池”作用。

数字经济显著提升劳动者就业质量。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工具的广泛应用，使远程协作、弹性工作、移动办公成为可能，打破了传统工业经济模式下对工作时间和空间的严格限制，赋予劳动者更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有助于实现工作与生活平衡，提升工作满意度。在线学习平台、虚拟技能实训系统等提供了丰富、便

捷、个性化的学习资源，使劳动者能够根据自身需求和市场变化，持续更新知识、提升技能，增强了职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和抗风险能力。数字平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劳动者能够更便捷地对接市场需求、参与公平竞争，拓宽了价值实现渠道，增强了工作的获得感、成就感。

数字经济有力促进整体就业结构优化。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与技术加速迭代，对人力资本提出更高要求，客观上推动了就业结构向高端化、知识化、技能化方向转型升级。数据分析、算法优化、智能决策、创意设计等成为越来越多岗位的必备技能，促使劳动力从简单体力劳动和重复性操作岗位，向需要更高认知能力、创新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岗位转移。这不仅提升了劳动者个体的人力资本价值，也推动全社会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数字经济带来就业新挑战
数字经济在释放巨大发展红利的同时，也给传统就业模式和部分群体带来不小冲击，为就业提质扩容带来新的挑战。

技术性失业风险对就业数量形成潜在冲击。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能够显著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其在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的应用不断深化，使流水线工人、电话客服、银行柜员等程序化、重复性、标准化程度较高的传统岗位面临被替代风险。如果这一“机器换人”的进程过快，又缺乏有效的社会缓冲机制和转岗培训支持，就可能导致失业规模扩大。对特定行业、区域、技能群体的就业稳定性造成冲击。

技能供需错配加剧就业结构性矛盾。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演进，对劳动者技能提出新的要求，数字素养、数据分析能力、跨界整合能力以及人机协作能力等成为职场越来越看重的技能。然而，教育培养体系和职业培训体系改革滞后于技术变革和产业升级，导致劳动力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出现脱节。一方面，新兴产业和前沿技

术领域急需的高端复合型人才“一将难求”；另一方面，部分拥有传统技能的劳动者由于知识老化、技能单一，难以适应新岗位要求，出现“有岗无人、有人无岗”的困境。这种结构性失衡不仅降低了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也加剧了部分群体的就业困难，影响劳动者收入增长和职业发展。

数字鸿沟可能扩大社会就业不平等。数字基础设施的覆盖广度、智能终端的普及程度、数字技能的掌握水平、数字资源的获取能力，在城乡、不同区域、不同年龄群体之间仍存在差距，形成数字鸿沟。这一鸿沟可能导致农村居民、老年人、低收入者、部分残疾人等群体，在利用数字技术获取信息、学习技能、参与市场、寻找工作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难以充分享受数字经济带来的发展机遇，甚至可能被进一步边缘化。

塑造就业友好发展新范式
面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需要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优先位置，积极塑造有利于促进就业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技术路径和制度环境，努力走出一条数字经济发展与高质量就业协同并进、互促共赢的新路。

将就业友好纳入发展全局考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和战略思维，在制定国家及地方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产业政策、技术标准时，将就业优先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宏观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协调联动，形成政策合力，确保数字经济发展的各项举措有利于稳定和扩大就业、提升就业质量、促进就业公平。推动将就业友好相关指标纳入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引导各方力量共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就业良性互动。

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与高质量就业协同互促。人工智能是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要积极引导其朝着有利于提升人类福祉、增强劳动者能力、促进人机协同的方向发展。加强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和法律法规建设，明确算法设计、应用和监管的责任主体，提升算法透明度和可解释性，

保障劳动者在人机交互环境中的基本权益和主体地位。

构建适配发展需求的人力资本体系。必须加快教育数字化转型步伐，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需求高度适配的高质量教育体系。高等教育要优化学科专业结构，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复合型人才。职业教育要紧密对接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趋势，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和大国工匠。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实施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

充分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面对平台经济、零工经济等带来的新型劳动关系挑战，必须与时俱进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加快修订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创新适应新就业形态特点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工时制度、休息休假权利保障等。健全平台企业用工责任清单，压实平台在劳动者权益保障方面的主体责任。创新社会保险经办服务模式，优化参保缴费流程，扩大工伤保险等保障覆盖面，探索建立适应灵活就业人员需求的补充保障机制。畅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诉求表达渠道，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

着力弥合各类数字鸿沟。持续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特别是向农村、边远地区、欠发达地区倾斜，提升网络覆盖广度和深度，降低应用门槛和成本。大力实施数字技能普及工程，重点面向老年人、残疾人、低学历人群等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和帮扶，提升其数字素养。鼓励普惠金融、智慧养老、在线医疗、智能交通等领域数字技术深化应用，使数字技术更好服务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支持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创造更多本地化就业机会，让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作者分别是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中原大地，沃野千里。黄河奔流，滋养着这片古老而丰饶的土地。自古以来，河南便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素有“中原粮仓”之称。这里的小麦金黄饱满，玉米粒大质优，大豆香醇浓郁，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然而，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浪潮中，“中原粮仓”不再只是原粮输出的代名词，而是正悄然完成一场深刻的产业跃迁——从“中原粮仓”向“国人厨房”，进而迈向“世人餐桌”的迭代升级。

这一转变的背后，是一场关于农业现代化、产业链延伸与品牌价值重塑的系统性变革。一粒粒小麦被研磨成粉，一个个水饺被速冻保鲜，一袋袋汤圆被分袋四散，一瓶瓶牛奶被装箱运输……这些看似寻常的日常食品，实则承载着河南农业转型升级的宏大叙事。如今，河南各地农产品加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生产线上人机协同高效运转，科研机构与农户深度合作，农户与龙头企业利益联结日益紧密，一幅现代农业产业化的新图景正在徐徐展开。

从“粮头”到“食尾”，助力产业链纵向延伸

从“粮头”到“食尾”，折射的是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产业链条的深度重构与价值跃升。传统粮食产业局限于初级生产环节，呈现出“种强销弱、产粗用浅”的格局。而传统农业往往止步于初级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农民“靠天吃饭”，附加值低，抗风险能力弱。而现代食品工业的发展逻辑，则强调“粮头食尾”“农头工尾”的全链条贯通。所谓“粮头”，即以粮食种植为起点；“食尾”，则是以终端食品消费为终点。河南正是抓住了这一关键路径，推动农业由“种得好”向“加工好”“卖得好”转变。

以小麦为例，过去河南年产小麦超过700亿斤，大部分以原粮形式外销，利润微薄。而今，通过深加工，小麦可被制成面粉、挂面、方便面、速冻水饺皮、烘焙制品等多种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三全、思念等企业依托本地优质小麦资源，发展速冻米面食品，不仅满足了城市快节奏生活的需求，更将河南的面食文化推向全国乃至海外。据了解，全国每卖出10个速冻水饺，就有7个出自河南。这不仅产量的胜利，更是产业链延伸带来的市场话语权提升。

同样，双汇集团从小小的肉联厂起步，逐步构建起从生猪养殖、屠宰分割到肉制品加工、冷链物流、终端零售的完整产业链。其低温肉制品连续多年全国销量领先，成为中国肉类工业的标杆。牧原则以规模化、智能化养猪著称，年出栏生猪数千万头，保障了高端肉源供给，支撑了下游加工业的稳定运行。白象方便面坚持“土坑酸菜”零添加，赢得消费者信任，重新焕发生机；卫龙辣条将传统小吃工业化、标准化、品牌化，成功打入欧美市场，成为“国潮零食”的代表；蜜雪冰城以极致性价比和连锁运营模式，实现茶饮下沉市场的爆发式增长，门店遍布全球。

这些企业的崛起，标志着河南农产品加工业已从单一初加工迈向精深加工，从区域性供应转向全国乃至全球布局。产业链的纵向整合，不仅提升了产品附加值，也增强了对上游农户的带动能力。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再是单纯的种植者，而是成为“订单农业”的参与者、合作社的股东、产业链的一环。

产学研融合创新，助力“中原粮仓”产业升级

产业的转型升级离不开科技支撑。近年来，河南大力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搭建了一批国家级、省级农业科技平台，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联合攻关关键技术。例如，河南工业大学在粮食储藏、面粉加工、面制品研发等领域具有深厚积累，长期为三全、思念等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河南省农科院选育出多个高产、优质、抗逆的小麦新品种，显著提高了原料品质；郑州轻工业大学在食品包装、冷链物流、智能制造方面持续创新，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合作不再是松散的技术咨询，而是形成了稳定的协同机制。一些龙头企业设立研究院，引进博士团队，开展前瞻性研究；地方政府则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鼓励建立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比如，漯河市围绕“中国食品名城”建设，打造了集研发、检测、中试、孵化于一体的食品产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吸引上百家企业入驻，形成“政产学研服用”七位一体的创新生态。

数字化、智能化也成为驱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在双汇的智能工厂里，自动化屠宰线每小时可处理上千头生猪，全程无圈操作，数据实时监控；在牧原的养猪场，AI识别、环境传感、自动喂料系统让养殖效率大幅提升，一头猪的成长轨迹全程可追溯；在三全的速冻车间，机器人码垛、无人叉车运输、恒温仓储系统确保产品品质稳定。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增强了食品安全保障能力，让消费者吃得更放心。

品牌建设的持续强化，助力河南食品产业从“制造”迈向“创造”

如果说产业链和技术是硬实力，那么品牌就是软实力。过去，河南虽有丰富的农产品资源，但缺乏叫得响的品牌，常常陷入“为人作嫁”的困境——原料输出地，利润却留在别人手里，随着一批本土品牌的崛起，这一局面正在改变。

“三全”是中国速冻食品行业的开创者之一，率先推出速冻汤圆、水饺、粽子等产品，填补了市场空白；“思念”紧随其后，凭借差异化定位和营销创新，迅速占领高端市场；“卫龙”将一根辣条做成百亿级生意，靠的是精准的品牌定位和年轻化的传播策略；“蜜雪冰城”以“低价高质+强复制”模式，实现规模化扩张，其主题曲“你爱我我爱你”甚至成为网络热梗，品牌知名度极高。这些品牌之所以成功，不仅在于产品质量过硬，更在于它们深刻理解消费者需求，善于讲好品牌故事，构建情感连接。它们不再只是“生产商”，而是“生活方式的提供者”。例如，三全推出“家的味道”，强调亲情与团圆；思念主打“中国味·世界享”，彰显文化自信；卫龙走“年轻、潮流、有趣”路线，频频跨界联名；蜜雪冰城则以“亲民、普惠”形象深入人心。

品牌的崛起，反过来又反哺整个产业。一方面，品牌溢价带来更高收益，使企业有能力投入研发和渠道建设；另一方面，品牌影响力吸引更多资本、人才流入河南食品产业，形成良性循环。更重要的是，品牌代表着标准和信誉，有助于提升“河南造”在全国乃至全球市场的美誉度。

如果说“中原粮仓”解决的是“吃饱”问题，“国人厨房”回应的是“吃好”需求，那么“世人餐桌”则指向更高层次的愿景——让河南美食走向世界，参与全球食品竞争与文化交流。

事实上，这一进程已经开启。三全、思念的速冻食品出口至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华人喜爱，也开始被当地主流消费者接受；双汇收购史密斯菲尔德，成为中国肉类企业跨国并购的典范，其产品进入欧美超市；卫龙辣条出现在伦敦、纽约的便利店货架上，成为外国年轻人追捧的“东方零食”；蜜雪冰城在越南、印尼、韩国等地开设数千家门店，掀起“平价茶饮”热潮。这些出海案例表明，河南食品产业已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但也要看到，真正的全球化不仅仅是产品出口，更是标准输出、文化输出和品牌输出。未来，河南需要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体系的国际化水平，适应不同市场的法规要求；加强跨文化传播能力，讲好中国食品的故事；培育更具全球视野的企业家队伍，推动本土品牌真正融入世界。

在这片孕育华夏文明的土地上，新的丰收正在发生——那是产业的丰收，是科技的丰收，是品牌的丰收，更是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实现。（作者单位：郑州市委政策研究室）

由「中原粮仓」到「国人厨房」「世人餐桌」的迭代升级

韩枫桦